

四

鼓吹“神道” 为殖民统治服务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n.com

鼓吹“神道” 为殖民统治服务

吕元明

“建国神庙”与“惟神之道”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给其血腥侵略找出“理论根据”，大肆鼓吹“日满亲善”、“王道乐土”、“民族协和”、“惟神之道”等骗人口号，并把它美化为所谓“建国精神”。这些骗人的口号，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加强，不断改换其内容，以便为其最后吞并中国东北制造荒唐的理论根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首先利用溥仪等，发表一个“满洲国建国宣言”，宣扬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实行“王道政治”，建设“王道乐土”，标榜“满洲国”的“独立”。同时，日本侵略者为了欺骗世人耳目，又宣扬日本是“新国家”的“友邦”。伪满洲国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友邦”日本出兵帮助的结果。

1934年，溥仪当上“皇帝”，被召到日本去拜谒日本天皇，日本大肆宣扬伪满“建国”是“沐日本天皇的皇恩”、“顺天之意”而建立的。因此，溥仪从日本回来后，发表了一个所谓“训民诏书”，胡说什么他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要东北人民和日本“友邦一德一心”，东北人民应感恩戴德、服服贴贴，作牛马，当顺民，任日本侵略者宰割。这样，“日满”关系变成了“一德一心”，在“法律上”成了“不可分”的关系。以后，日本侵略者把日本说成是“盟邦”，又把伪满初期标榜的“王道”换成了“皇道”。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使东北彻底殖民地化，又玩弄了新的花招，决定在伪新京建立一个所谓“建国神庙”，供奉日本“天照大神”，作为吞并我国东北归为日本版图的一个标志。因此，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叫傀儡溥仪于1940年第二次“访问”日本，让他把日本的“天照大神”捧回来，当作“建国神”供奉在“建国神庙”里，表示伪满的开始不是起源于清始祖，而是和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然后，经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以溥仪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国本奠定诏书》，说伪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神光”保佑下建立的，溥仪和日皇亲如一人，因而伪满洲国的“国民”也就是日本国民的一部分，伪满洲国也就应该为日本所统治，从而把“盟邦日本”改称“亲邦日本”。

什么是“亲邦”呢？日本侵略者说：“亲邦就是父母之国的意思，日满两国的关系，就像父子的关系，至亲之爱和道义，把两国结合在一起。”事实上，从“建国神庙”出现之后，伪满的许多日本官吏都公然讲：“日本是你们的父亲，你们是儿子，儿子明白吗？”

紧接着，日本侵略者还炮制了一个所谓《国民训》（共五条），强迫中国人背诵，其中第一条说：“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从此“惟神之道”就成为摧残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荒唐说教。所谓的“天照大神”，本来是一个日本迷信的天神（原始神话的太阳女神），是日本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制而编造出来的，把它看成是日本国产生之始。他们叫溥仪捧回“天照大神”（实际上只是一支剑和一面镜子），暗示溥仪是日本天皇的后代，使之舍弃复辟清朝的念头；同时用“建国”始于日本神这个谬论，把中国东北纳入日本的版图，使之成为日本的

领土；另外又胡说伪满是“奉天照大神为建国元神”，炮制了“惟神之道”，强制东北人民接受，从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使之“皇民化”。日本侵略者说：从傀儡“建国”到“惟神之道”，是“从独善性进入到对日本的依存性”。伪满的“独立”外衣，到了此时已经被日本殖民主义者完全剥掉了。一个日本神供在伪首都新京，就成了伪满“国体”的大事，国家的性质变成了降下一辈的从属国，而下一步就是并入日本版图了。

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带头，天天向建国神庙行礼，表示对它的虔诚。日本侵略者还强迫中国群众也向它行礼，承认它的权威。甚至在伪“保安法”中还规定：如对“建国神庙”有“不敬罪”者，要判处一至七年的徒刑。

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是把“满洲国”的发展历史分为“建国，日满一德一心，惟神之道”这样三个阶段”。从这三个阶段中，我们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吞并中国东北所玩弄的三个把戏：即从“友邦”至“盟邦”；最后变为父子关系的“亲邦”，这真是历史上罕见的侵略行径！

日本殖民主义者力图通过日本宗教迷信，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除了在伪都搞“建国神庙”外，还在东北各地搞了不少日本“神社”。据1945年统计，日本在我国东北城乡搞了大小日本神社295座。他们妄图通过这些日本军国主义崇拜的神灵，给中国人民套上精神枷锁，使中国人民“皇道顺化”。

对封建意识形态的利用

在伪满十四年的殖民统治过程中，日本殖民主义者广泛地利用了封建意识形态。日本帝国主义本身就带有封建的特征，而中国封建阶级经常是帝国主义的附庸。

在伪满初期，日本侵略者曾经特别着重利用了儒家思想。伪

满“独立”打起的一面旗帜是“王道乐土”。日伪当局特地解释这是来自于孔丘的“先王之道”。1931年，当日本殖民主义限禁使用中国课本的时候，曾经让学校开设“四书五经”课。封建余毒成了殖民主义者利用的东西。当时卖身投靠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一批汉奸，特别卖力地鼓吹伪国家遵从孔孟之道。1932年在“振兴孔教”、“祀孔参政”的旗帜下，伪国家把一年两次祀孔列为国家法定祭日。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孔教进行殖民和统治，和伪满傀儡打算以孔教进行清室复辟是不一致的。1932年和1933年，伪满傀儡还穿着清代祀孔的封建大袍子，到文庙去祀孔，在日本殖民主义者中间，夹杂着戴着貂尾帽子、足登厚底鞋、身着绣袍的清代一群遗老，真有点清室复辟的样子。然而，日本殖民主义者很不以为然。在主子一声训斥下，傀儡们便俯耳听命了。日本侵略者通过报刊、广播多次说，伪满不是“满洲历史的继续”，相反倒是“日本历史的继续”。1939年伪民生部发布命令，以后祀孔不再穿清服，改穿“协和服”，也不再行清代的三拜九叩礼，改行日本式的三鞠躬。到了1940年，把日本“天照大神”供到“建国神庙”里，日本殖民主义者曾经想废止祭孔。但考虑到封建意识形态对中国人影响之深，仍有利用的价值，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者还是没有最后废除祭孔，但是却把“建国神庙”的祭祀列为伪国家“建国”的大典祀日，而把祭孔排在从属的地位。

伪满时期，还利用其他宗教来控制 and 麻痹中国人。除了日本宗教之外，据1942年统计，佛教有寺庙2 100多个，僧侣5 000多人；道教观2 300余个，道士4 000余人；伊斯兰教寺院200多个，阿訇400多人。伪满在蒙族地区，也利用了喇嘛教，还利用了其他一些“慈善”机关。

日本殖民主义者还利用了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

伪满初期，日本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东北的宗教信仰进行了广泛调查。1939年，伪民生部公布宗教规则：各宗教宣传教义、扩建设施、立庙修寺、转移迁居、修办合并等等，都须得伪民生部“大臣”批准，不合规则者受罚。实际上宗教信仰自由已经不存在。在信仰方面得听从日本殖民主义者指挥。日本殖民主义者为了便于管理和控制，于1939年建立了各种宗教的统一组织，如伪“满洲国佛教总会”、“道德总会”等等。

有不少日本人直接参加伪满佛教、道教、基督教等的活动，其中有些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主义分子。拿“在家理”这种信仰组织来说，最初是中国人的秘密结社。日本殖民主义分子打进这个结社里，策动了一部分“在家理”的头头，使这个组织的一部分信仰者在政治上支持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1933年，“在家理”在日本殖民主义分子策动下发生了大分化。1934年由汉奸冯谏民当委员长，建立了“大满洲国正义团”，公然为日本殖民统治者效忠。

伪满时期，以布教为名跑到东北的日本基督教传教士，有些人是和军队、伪政权勾结起来，干着压迫中国人民的勾当。有些人还跑到抗日斗争激烈展开的热河地区，名曰“布道”，实际上是破坏中国的抗日斗争。1939年策划成立“满洲传道会”的日匹信亮，就曾跑到热河去“传道”，干了许多破坏中国抗日斗争的勾当。日本一伙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分子，曾把抗日斗争迅猛发展的热河地区作为“布教”重点，进行所谓“宣抚”工作。

表彰“孝子节妇”，也是伪满时期日本殖民主义者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的一种方法。截至1943年，日伪共搞了孝子700余人，节妇2700余人，烈妇28个，贞女2个，义仆6个，懿行

400余人，耆老48个，总计3600余人。日本殖民主义者鼓吹说：“孝子节妇”是“王道之源”，“国民道德的根基”。还说这些“孝子节妇”是伪“国家”、伪“国体”的代表，是“建国精神的发扬”。特别把卑躬屈膝于日本统治者的一些表现，列为“孝子节烈”的标志。由此可见，日本殖民主义者利用中国封建意识形态，是为其殖民统治服务的，是为了从精神上束缚中国人民。另一方面，封建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在敌伪统治下也成了殖民统治的附庸。

（摘自《伪满洲国史》）

伪满的祀孔

王国璋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统治，防止人民反抗，除用极残酷的血腥镇压外，更以笼络来麻痹中国人民思想，对中国人民固有的某些习惯，加以保存和推行，以掩盖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并维持其统治势力。对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祀孔等民间固有习惯节日极为重视，在各节日均行放假一日到四五日不等。其中对祀孔更为重视，这并非是尊重中国人民的习惯，重要的是麻痹中国人民思想。日本侵略者既利用孔子学说，就必须重视孔子、尊敬孔子，以蒙蔽中国人民。祀孔活动是尊敬孔子的绝好机会，所以对祀孔要隆重举行，每年要实行春秋二次祭礼。在我的记忆中，以1933年秋季祀孔最为隆重。

祀孔活动是由伪满文教部礼教司负责。在1933年的暑假以

前即着手准备，购买或订制各种应用物品。长春市原有文庙坐落在东二道街，规模不太大也没有其他关于祭祀时所用的物品，只有大成殿、东西庑及后殿、崇圣祠几栋房子，室内也只有供桌和牌位而已。这次祭祀是溥仪亲临致祭，祭祀要格外隆重，必须按古礼举行，因而特制了乐器、旌旗和服装等物。乐器有门鼓一、门钟一、大鼓二、钟一、磬一、边钟一、边磬一、歌一、祝一、博附二、笙四、笛四、箫四，此外旌旗类的麾和节各二支。所有这些乐器和旌旗，是和沈阳市故宫内陈列的相仿。掌管这些东西的人，分舞生、歌生和乐生来担当歌舞和奏乐。由附近小学的高年级男生来担当歌生和舞生，由市内各小学的音乐教员及擅长乐器的其他小学教员来担当乐生。这些人的服装是由文庙给准备的。

在1933年暑假期间，伪满文教部特派沈阳市担当祀孔歌舞指导的某小学教师（姓名忘了）来长，负责训练歌生和舞生达20余天。

这次祭祀大约是在九月下旬的丁日，由伪执政溥仪（那时还没有称皇帝）亲临祭祀，届时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将通往文庙的道路进行维修，沿途安装大的电灯和聚光灯，文庙门前还铺上一层黄土，门上安上彩灯，文庙院内和殿内原无电灯，这次也安上电灯。祭祀的时间是在早晨2时，所以在前一天的晚上，文庙附近实行戒严，满布着伪军警，还有日本军队也参加在内，不准行人接近。由于在午前2时举行祭祀，而担当的歌生和舞生的学生，家居分散，恐怕临时来得不齐，因而将这些学生于前一日晚上集宿于文庙小学校宿舍内，由于这些学生年龄不大，又系从各个家庭来校集宿，感到新奇，加之宿舍也不大，拥挤不堪，致使长时间不能入睡，吵吵嚷嚷直到午夜1时，即起来准备。

祭品有整牛1头，整羊12只，整猪12头，分别陈列于各殿外檐下，还用厨师七八人专做各种祭菜，足做了一下午，也不知做了多少，供桌上已经摆满了。祭礼完毕，祭肉则按官职的大小，分别分给参加祭祀的人。

参加祭祀的人的服装，除歌生、舞生和乐生是由文庙准备的，其余之人完全自备。歌生和舞生的帽子系蓝色，帽顶系一长方形平板，身穿蓝布长衣，黑色镶边，足穿蓝布鞋。歌生是8人手持笏板，立于阶上。舞生是64人采取“八佾舞于庭”的形式，排列在阶下。乐生24人还有执麾节的各2人头戴坤球帽，身穿蓝缎长袍，鸭蛋青色镶边，袖头也是鸭蛋青色，翻卷成马蹄袖，腰系鸭蛋青色腰带加飘带，足登大绒青色长靴。穿起来活像东北的狐仙庙内泥塑的胡三太爷，令人哭笑不得。其余参加祭祀的人一律蓝袍青褂，坤球帽和长靴，其中的日本人也是一样。但除主要祭祀的人外也有不戴坤球帽而代之以帽头的。

祭祀当时先祭崇圣祠，由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主祭，之后则祭祀大成殿及东西二庑。大成殿主祭由溥仪担当，四配及东西二庑的主祭人则由各部大臣担当，没有担当主祭的大臣和一些有地位的伪官吏，均做陪祀官在阶下陪祭，担当执行祭祀的是一些下级伪官吏和中小学校长。祭祀时实行跪拜礼，行三拜九叩礼，当时歌生唱歌、舞生做舞、乐生做乐，殿内高燃蜡烛，香烟缭绕，酒气触鼻，歌乐齐奏，呈现一片严肃景象，似乎是对孔子的真心的祭悼。祭祀时由迎神开始，然后举行初献、亚献、终献，最后为送神。在全部祭祀时有歌有乐，只在举行初献、亚献和终献时才有舞。歌和乐都是四字和四音为一节，每节的前二字各为二拍子，后二字各为四拍子。舞也是按乐和歌的拍节，每一字为一动作，动作比较简单，分八行排列于庭前，舞生各手持长约二尺许的红色木棍二根，其中一根顶端还插有一野鸡

翎。

溥仪只参加过一次。据说在溥仪参加祭孔后，在下次祭祀前半月时间，在文庙内发现有炸弹，所以溥仪以后再也没有参加祭祀，由伪国务总理郑孝胥担当主祭。郑孝胥离职后，则由张景惠担当。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殖民统治的目的，是怎样利用一些要职人员进行祀孔活动的。

别有用心的日满学生讲习会

宪 均

1933年3月间，我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学习，日本外务省嘱托（日本神官）小笠原省三到学生俱乐部来访我，说要办日满学生讲习会，请我率领伪满学生参加。我集中了120余名留学生参加了讲习，日方方面也参加了30余名。讲习场所在“一桥”（地名）日本商科大学讲堂，每晚讲四个钟点，讲习10天。讲演的10人都是日本第一流的学者，经费由日本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费项下支出。讲习题目如下：

演讲题目

讲演者

1.《由地理历史方面看满洲》

白鸟××文学博士

2.《满洲的古代建筑》

矢吹××工学博士

3.《满洲的古墓》

鸟居龙藏文学博士

4.《支那乐器的特征》

田边尚雄理学士

5.《支那佛教》

××××

6.《老庄学》

小柳司气太文学博士

其他几项还有什么日本武士道、惟神之道等等。

讲习后有茶点座谈会，讲习当中有速记，讲习后，把讲习录集成一部书在日本各书店（出版价1.26元）发售。小笠原省三还送了我一本。

白鸟讲的《由地理历史方面看满洲》主要意思是：满洲由地理上可分三部分：其一是黄土地带，以辽河、松花江沿岸为中心的产粮区域；第二是森林矿山地带，以吉林、兴安岭、通化为中心的木材矿产地区；第三是沙漠地带，以兴安为中心的牧马牛羊区。这是个有丰富物产的地域，北边有黑龙江、乌苏里江，东边有鸭绿江、图们江，南边有万里长城又有旅大、安东等海口，因此满洲由地理学看来是一个天然的独立地区。其次由历史上看，满洲曾有过高句丽国、渤海国、辽、金、元、清等强盛国家连续地出现。满洲这块土地实际上没有受到汉民族的统治。总而言之，他的讲演就是说满洲不是中国的。

《满洲的古代建筑》，矢吹讲演。大意是说：第一是满洲一带的古塔——砖塔，除去朝阳的北塔是唐的建筑外（唐塔是方形塔），其余所有的塔都是辽金以后才有，尤其是辽塔最多，其形八角，在建筑学上看来比唐塔发达很多。第二是大凌河岸的万佛洞和义县的大佛寺，这也与中国内地的建筑有所不同，有满洲独特的建筑方式。第三是承德的喇嘛庙，这些庙在建筑学上看来是世界上有名的技术，是与中国一般建筑完全不同的。总之他的讲演是说，满洲古代建筑有满洲的特色，宁可说比中原的进步，而不是受中原的影响。

《满洲的古墓》，鸟居龙藏讲演。他讲的大意是由古墓证明高句丽、渤海、辽、金等各时代的文明兴盛，国土广大，甚至提出契丹文字是汉文字系统以外的系统文字，满蒙文字更不必说。总之，他的意思是说满蒙民族系统和文化系统，不属于中

国。

《支那佛教》，讲演者氏名忘记。讲演大意是说，支那佛教是支那佛教。满蒙佛教是满蒙佛教，是喇嘛教，跟支那佛教不相同的。

《支那乐器的特征》，讲演者田边尚雄。他说在中国古书上根本不见弦子、胡琴等乐器。弦子是元朝传入中国的，胡琴更是北方的东西，至于笛子也有六眼、七眼之别，也有南北的区分。总之就是乐器满蒙也是有其独立性。

《老庄学》，讲演者小柳司气太。他说日本人若不研究老庄学，不可能了解中国。中国人不了解老庄，不能在社会上存在。老庄思想支配着中国社会大多数人。表面上，中国虽受儒学的礼教统治，在思想里老庄的学说势力很大。那么老庄学的根本是什么呢？说是处于“有用无用之间”，脱离政治。总之他的意思是不叫人们去参加政治。

这个讲习会的目的，是从各方面证明满洲与中国不是一家，用各种学说麻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头脑。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民族离间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

日本侵略者伪造 和篡改历史的卑劣伎俩

郭布罗·润麒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为了掩饰犯罪行为，对东北的历史进行伪造和篡改，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欺骗中国人民，缓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仇恨。

他们想把东北的人民和关内的人民分离开来，把伪满洲国成立以前的东北历史一笔抹杀，说什么，伪满洲国是“奉天承运”出来的，溥仪是什么第一代创业的“君主”，所以在他以前之历史就无须乎考据，世界上哪个国家在有史以前不都是混沌的，追究又有什么用？意思就是说，东北这块土地，在伪国成立之前还是太古洪荒的时期，既无人，又无生物；又说东北这块土地，原来根本就不是中国的领土，不过被“霸占”了多年，误认为是中国的领土罢了。现在“满洲国”成立，与中国“脱离关系”正是恢复原来的状态。这种荒谬绝伦的说法还不算奇怪，更奇怪的是说，东北这块土地，原来是日本的，在中国人尚未来到此地的很早很早以前，日本的神就降临了。因为他对当地有功，当地人“感谢”他，并替他建了庙祭祀他（这个庙指吉林小白山上的关帝庙、娘娘庙来说的，下面详述）。

1932年伪满成立那年，有一个日本人，名叫金子定一，自命为中国通，是个退役的少将，早年充当过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的部附，后来退役即在东京流浪。他为了迎合当时帝国主义者的心理，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些关于中国的荒谬的文章。那时我也在东京，记得看见这样一篇怪文，题为《大和民族大陆还原论》。它的内容大略是这样：日本民族原本生在大陆（当然指着中国大陆）上，后来因向海外发展，才成了今日的日本，这次日本人又进入了中国大陆（指中国东北），正是日本民族的大陆还原。意思就是说，现在在东北居住的中国人，是外来的，他们日本人才真正是“原住民族”。

1940年，我正在吉林伪军管区，听说由日本来了一个调查团，说不久要来吉林做学术调查。果然不久大队人马便来到了吉林，我记得能有10个人以上。我当时想，既然说是学术上的调查，调查团必是由些学者组成的。没想到来了一看，却完全

不对，团长不但不是什么学者，相反却是一个以侵略中国为职业的日本浪人，名叫川岛浪速。这个人年逾八十，两耳全聋，但精神奕奕，团长是如此的人物，团员就不必问了。

这个调查团到了吉林，首先声明，是参拜小白山的庙，其次是调查该庙和日本神道的关系。

他们说：这个庙（指吉林小白山上的庙，是老爷庙还是娘娘庙，现在记不清）的建筑方式和庙中所陈列的祭器、执事等（金瓜、钺斧、朝天镪）的样式跟日本“素盞鸣尊”（天照大神的儿子）所用的东西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也未敢说完全一样），例如庙的斗拱、祭器中的香炉和执事中的大刀。

因此便很快地下了结论，说这个庙，原来就是祭祀素盞鸣尊的庙，根据日本的历史（不用说是他们临时瞎编的）某年某月，日本神素盞鸣尊，降临此地，建立了“国家”。这个“国家”的成立，是在这块土地上尚未存在过任何民族的时候，意思没有别的，就是胡搅蛮缠硬要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的疯狂罪行，说成是“回老家”的“合理”行为。

在1928年或1929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野心，将变成具体行动的时候，在日本全国各地，流行着一本著作名为《成吉思汗即是源义经》（忘记著者的名字了）。这本书著作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夸张日本民族的伟大性和鼓吹他们的优越感。把称雄世界的人物，说成是他们日本人，当时很博得一些御用学者的赏识。但真理究竟还是真理，不能颠倒的。因为这本书的内容过于荒唐，与事实的年代不相符（源义经才一岁的时候，成吉思汗三四十岁了），稍有点常识的人，谁都不能相信，所以这本书喧嚷一时，不久就冷淡下去了。但后来，日帝侵略者们为了混淆是非，加紧侵略，便又把这本旧帐重新翻出来，说什么成吉思汗就是源义经的化名，东北这块土地，都是700年前，源

义经一手建立起来的，意在言外就是说，这块土地就应该属于日本，这种荒谬的说法，真是不值一驳，只能供做笑料罢了。

日本帝国主义又说，“世界上最老的国家是他们日本”。我在伪满军队里，曾看见过关于宣传日本是世界第一的老国的图表（这图表长约一米六七、宽约有一米），上面用极美丽的色彩绘成世界各国的历史年代表，最上不用说是日本了，把他们存在的历史硬延长了二三千年的，其次是埃及，再其次才是中国。这个荒谬的糊涂图，当时各地的伪机关和学校都有配挂，这个意思就是要使中国无论在历史上、文化上，也都要比日本晚几辈儿的。

接伪“神”的经过

薄仪

这是1940年，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推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策而主持策划的。后来我听说关于这个接伪神的阴谋，日本早有计划。有两件事（后一件事是我听说的），我愿说一说。

一、在1939年，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曾指挥侵略蒙古人民共和国，被苏军同蒙军把它粉碎（即诺门罕之役），由于侵略失败，跟着他就被撤职。当他临回日本之前向我告辞的时候，他对我表示过，日满的亲善关系，如果将来能使两国宗教信仰也一致，那就更好。当时，我想是他个人的话，后来才知道这是日本的国策。

二、（这是我听说的）这个接伪神的事，关东军早有计划，没想到日本国内的本庄繁不赞成这事。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曾

派人和他疏通。我想本庄并不是反对日本的宗教侵略，这只是他的老奸巨滑，他不主张急进，而是取稳进主义的宗教侵略而已。其实早在我没去日本前，伪宫旁就已准备了伪神庙的奠基。1940年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命吉冈安直通知我上日本见裕仁，迎接伪天照大神。吉冈说这是表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的关系，说日满宗教必须一致。我问他，满洲本有宗教，何必多此一举？他声色俱厉地说，这是军司令官通知我的，这是日本既定方针，没有任何犹豫余地。我也听谷次亨说过，星野直树伪总务长官曾在伪国务院向谷次亨、丁波说，迎接伪神这是日本既定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我答应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要求。后来，吉冈又给我一张字纸，限定我对裕仁所谈的话。他令我向裕仁表示：“我根据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的关系，我衷心愿意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等我到了日本，见裕仁的时候，我便掏出吉冈给我的字纸，一面看，一面向裕仁说的。我说完了，裕仁便对我说：“这是陛下自己的事。既然陛下愿意，我只得从命了。”他刚刚说完了这话，登时起来用手指着早已准备好了的一个桌子上摆的一个长方匣，还有三件东西，对我说，这就是神器。这一切说明，一切都是早准备好了的，不过要我为日本作这个傀儡戏而已。日帝自己不便把伪神搬到东北令人祭祀，想尽办法，勒令我去完成。在我把伪神接回的途中，吉冈安直取出一纸告诉我，这就是回国后要颁发的《国本奠定诏书》的原文。他令我回长春，必须立即颁发这伪诏书。这是伪总务厅嘱托佐藤知恭所拟定的，也就是星野直树所制定的。第一次访日回东北前，远藤柳作仅口头告诉我必须颁发伪《回銮训民诏书》。这次吉冈竟拿出早作好的伪诏书全文。这说明他们是在东京取得日本有关人员同意的。回长春后，伪总理张景惠把伪诏书拿来，经我签字颁布。紧接着日本侵略者又制定了

一连串的计划：建立伪建国神庙；派桥本虎之助当伪祭祀府总裁，沈瑞麟当副总裁；规定对伪神庙失礼为大不敬，受严惩。头一次所谓大祭，规定我向它拜，关东军司令官以及伪总理以下伪满汉奸大臣等都参加。又规定每月十五日我向它拜。并令伪官吏、伪军都须向它拜，强迫学生以及市民向它拜。从此以后，吉冈安直随时令我向它拜。凡是在日伪报纸上登载日本侵略者打了胜仗的消息，吉冈就令我上伪神庙拜，算是谢神府保佑日本得胜。后来日本愈战愈败，报纸上尚掩饰说，前天皇军玉碎了多少，昨天又体当了若干。吉冈急急慌慌地令我赶紧到伪神庙祈祷神佑。就这样拜到日本全面投降，一直到强迫我上了通化大栗子沟，吉冈还跟我寸步不离，桥本虎之助还捧着伪神器，直到在沈阳被苏联军逮捕为止。在伪满时，吉冈由日本约来一人名宽克彦，说是给裕仁母亲讲伪神道的，足足地给我讲了好几个月，给汉奸官吏也讲。

关于《国本奠定诏书》

古海忠之

天皇制日本军部异想天开，硬是以“满洲国建国精神即日本精神，日本肇国的大理想归结于‘八纮一宇’”精神为由，在薄仪头一次访日后的诏书中宣布“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日满一德一心”，而作为将这种关系在精神方面更加彻底地加以贯彻的手段，又试图将“天照大神”以某种手段移至满洲国。关东军第四课长片仓衷根据军部的这一意图，从1938年秋起，活动满洲国政府要人、特别是卖国的中国人首脑者，极

力鼓吹“祭祀满洲国一般人民尊敬之神，通过经常叩拜，统一国民精神，这对满洲国是绝对必要的；唤起敬神观念，使人们有所寄托，提高道义感，这种精神工作是应该做的”。片仓衷还装着的确民主的样子，说“这主要是中国人的问题，因此必须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前后召开了十多次讨论关于神的问题的会议。作为国民崇拜目标的神，中国人首脑中，有的主张孔子，有的主张关帝，意见纷纷，莫衷一是。片仓衷提出天地人三种之神，继续进行研究，所谓“地之神”，他提议将“为满洲建国而献出生命的人们”（即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充当镇压抗日救国的爱国者的肉弹而卖命者）合祭，建造像日本靖国神社那样的东西，结果得到赞同；接着，作为“人之神”，他又提议祭祀明治天皇，就这样一步步地制造了祭祀天照大神的气氛。对于皇帝溥仪，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梅津美治郎直接与其谈话。于是，1940年6月，借皇帝溥仪为祝贺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第二次访日之机，实现了计划。

皇帝溥仪自6月22日起在日本访问19天，亲自向日本天皇祝贺纪元二千六百年，并与日本皇帝尽情交欢之后，参拜伊势皇太神宫、橿原神宫和各地天皇陵寝。7月10日归返新京。15日安放从日本带回的“神体”，在帝宫内建造建国神庙，祭祀天照大神。同一天，张国务总理等文武百官，特殊会社代表300余人齐集帝宫，举行了所谓《国本奠定诏书》颁发式典。

通过《国本奠定诏书》的发布，把原来还比较暧昧的“满洲建国精神”规定得极为明确。通过这一诏书，把日满两国的立国根本同一起来，即都是基于“惟神之道”，并以皇帝名义宣布。换言之，满洲国虽然采取独立国的形态，但是与日本则是完全一体的，承认为日本的延长。

《国本奠定诏书》也是同样，皇帝溥仪并没有发布诏书的绝

对自由。诏书虽然出自宫廷，但重大诏书原则上都是先由总务长官和关东军第四课长以上首脑拟定梗概，然后通晓中国古文的佐藤知恭，根据总务长官的指示，将之拟成中文。原稿须经关东军同意后，总务长官才亲自去皇帝溥仪处听取意见，再与关东军首脑商议，进行部分修改，溥仪同意后才算完成诏书原稿。事实上傀儡满洲国皇帝必须同意，因为他不同意也必须发布。

于是，满洲国也祭政一致了。政府明确，满洲国的祭祀属于皇帝大权。为掌管有关祭祀事项，设祭祀府。1940年7月15日，在修改满洲国基本法《组织法》的同时，公布了掌管建国神庙及建国忠灵庙（即祭祀片仓衷所说的所谓“地之神”）事务的祭祀府官制。

本来，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国通过日本人支配体制的确立，日满共同防卫，日满经济一体化等，从政治、经济、军事上牢固地掌握了满洲国，现又通过了《国本奠定诏书》的发布，把精神、思想与日本一体不可分的关系强加给中国人民。这种对东北人民进行全面镇压和愚昧化、奴隶化，强制推行政策，绝不是表示日本帝国主义强大，而倒是虚弱的表现。

（摘自古海忠之等所写的日本侵华史料，标题是原有的。）

大搞“惟神之道”实行奴化教育

曲秉善

在溥仪第二次访问回到长春的第二天，日伪的喉舌《大同报》，大字登载了伪皇帝溥仪到日本去，倍受日本皇室的优待，

并亲拜日本伊势皇太神宫，在感激之余，誓心供奉“天照大神”，以祷国民的福祉。不多日子后，就拿溥仪名义发出所谓《国本奠定诏书》。诏书内强调溥仪信奉“天照大神”以祷国民的福祉，莫国本于惟神之道，张国纲于忠孝之教。同时，伪政府也公布了祭祀府的官制，置总裁副总裁神官等掌管供奉祭祀“天照大神”的祀典仪式等。规定供奉“天照大神”之庙名曰“建国神庙”。祭祀府的总裁由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长桥本虎之助充当，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长换了三宅光治；又公布了对于“建国神庙”所谓不敬罪的惩治法。遂在溥仪住所（所谓伪宫廷）的后院修了一所小庙，就是供奉“天照大神”的所谓建国神庙，由溥仪按期奉祀。伪政府对全伪官公吏、人民团体职员都发给一个圆型的“建国神庙国本奠定纪念章”，每逢有重要式典时必须把它佩带在规定的位置。日本帝国主义者马上利用起他们苦心制造的“侵略工具”（即天照大神），疯狂地普及“惟神之道”，崇敬“天照大神”，在精神和思想上进行毒化，使我东北中国人民遭受了无限的危害。日本帝国主义把“惟神之道”和日本帝国主义式的“忠孝之教”，作为教育中国人的基本精神。在学校里强使学生背诵所谓《国本奠定诏书》，在所谓建国精神课程内讲解“惟神之道”和日本帝国主义式的“忠孝之教”，颂扬“天照大神”本质的“德惠”，强使学生记忆，考试时考它，升学投考时问它，向纯洁的儿童青少年学生们的头脑里灌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制造的那种荒唐无稽的麻醉剂与奴化剂，妄想使东北中国的学生们、青年们忘掉祖国，认他们制造的祖先为祖先，甘心受他们的侵略。侵略者们又说：“惟神之道不是宗教，乃是知与行的结合”，所以，他们在每天学生早操之前，使学生遍拜日本皇宫（即日本天皇裕仁的住所）、建国神庙、帝宫（即溥仪的住所）。在每次将要吃饭之前，学生们必须闭目对“天照大神”

表示感谢，然后方能吃饭。学生们每在听读所谓诏书时，或在课堂上听到说“日本天皇”、“天照大神”、“皇帝”时，必须肃然立正或端坐屏息倾听，否则即受严罚。日伪政府时常要求学生到各地日本神社去参拜、去勤劳奉仕（即劳做），又对学生们说：“每逢经过日本神社前时或帝宫前时必须敬礼，否则即按规定处罚。”开原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即女子学校）日本主事强使学生种水稻田给“建国神庙”种祭米。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些规定，使东北的中国青少年学生们的精神无时不感受威胁，健康也受到莫大损害。日本帝国主义又用所谓“国兵法”强迫东北中国青年入营，为使之成为他们的忠实的炮灰，在各兵营里都设有“建国神庙”的分庙，妄想使其忘掉祖国弃掉同胞，做他们的忠实的走卒。在各伪机关人民团体里早会时全都遥拜皇宫、建国神庙、帝宫，每有集会、仪式时都要读所谓《国本奠定诏书》和遥拜，录取新职员或伪官吏投考官级时都要考“惟神之道”。伪政府又规定了“建国神庙”创建纪念日，逢此日全东北民众各户要悬挂伪旗，各机关、学校、商行放假休息，在长春“建国神庙”举行大祭，各机关、人民团体、学校都举行庄严的仪式。日伪政府又规定凡通过各地日本神社之前必须对之敬礼，即或坐在电车大汽车里的人也必须起身对之敬礼。各团体又时常率领市民男女到各地日本神社参拜和勤劳奉仕。如有中国人对“天照大神”、“建国神庙”稍加评论或发出不慎的言辞时，即以犯了“不敬罪”处以严刑。1941年时我听说，伪铁岭市市长中国人徐渐九在学校校长会议听到日本殖民者讲所谓惟神之道，他回到他的办公室里对一部分校长说：“是什么东西，把老张家的老祖宗硬教老李家供。”想不到在这一部分校长中有日本人，就把徐渐九告发了，拿到法院下了狱，以徐渐九犯了“大不敬罪”判处长期徒刑，直到日本投降时他尚在监狱

里。日本殖民者又利用这侵略工具进行各种掠夺，在东北各地划出给“建国神庙”种供粮的土地。在那块土地内不准种他们指定以外的作物，把土地用黄绳圈上，所得的生产成果必须悉数给伪祭祀府送去，使辛苦终年的农民一无所获。并利用“报本溯源”作借口施行掠夺，每年春季在“建国神庙”举行丰年祈愿祭祈祷丰年，如果那年适逢丰收时，则说这是由于神赐，必须对神表示感谢，以报神恩。1944年武部六藏就用这个花招，在各省将1943年度指定粮谷出荷数量完成后，于1944年的春季，硬说1943年受神（即所谓天照大神）的庇祐得到丰收，应感谢神恩，强迫各省再出荷10万多吨，共掠出50余万吨。这种利用报恩出荷的名义，在完成指定出荷数量之外，又迫使各省出荷之事，不仅这一次。日本殖民者还利用1942年伪满庆祝伪政府成立十周年之时机，使溥仪在十周年敕语中，用“亲邦”（即指日本而言）字样来形容两国关系。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还发表了讲话，解释亲邦的意义说：“亲如父子。”就是意味着，日本是伪满的父邦，伪满是日本的子邦。从此以后人们在说话时或写文章时都要称日本为“亲邦”。同时，来到东北的日本人也都更加趾高气扬。自以“亲邦”的属民自居，骄傲蛮横。1942年我曾听人讲过，在大石桥有一位中国人，他是伪协和会的伪分会长，有一天他和车站的日本人口角起来，日本人把他打了。日本警察来后，那个日本人诬蔑说中国人打他了，于是那野兽般凶暴的日本警察就说：“你是协和会的分会长，你不知道日本是你们的亲邦，日本人都是你们的爸爸，好！你这东西竟敢打你的爸爸。”于是把那位中国人毒打一顿，还拘留了好些天才把他放回去。

奉迎“神玺”始末记

于跃东

神玺乃是日本神社里供奉的一个物件，这个物件，为什么名为神玺，我不太了解。其实神玺并不是什么稀奇之物，乃是长不满一尺半，宽不过一尺的一个木头匣子，里边装着一个稍厚的纸条，上面写上九个汉字，匣的外面为白色，木质很精细，在匣面上饰以简单花纹，有如两支箭头模样。这个神玺，虽属简单，但在伪满时期，由建国神庙取来，确不容易，要经过种种手续和仪式。我在伪满当过吉林女子国高校长，曾经参与奉迎一事。

伪满学校里，建筑神殿，奉迎神玺，这个事与学校教育有关，因为伪满的学校办的是奴化教育，而奴化教育的措施，虽然方式很多，而神道教育确占措施中的主要部分。为了说明事实，无妨先说学校建设神殿之经过。先是在伪康德初年，学校里的日军教职员，提议在校长室里设置神龛，我当然允许，不敢阻拦。神龛的形状，是长有三尺、宽有二尺，用木材做成的有如中国佛龛的样式，里面供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龛前设有香炉一个，花瓶一对，在花瓶里各插树枝一枚。这个神龛是钉在校长室的墙壁上，距离地面约有一丈多高，每天早晨教职员上班，须到校长室签到，在签到之前，即须向神龛行礼，退出后亦如此，这是学校里设神道教育的开始。同时在教学科目中，有建国精神一门课（后改国民道德），这门课程在各科目中，占着首要地位。担任这门课程的，多为日本教员，教材内容讲述

日本建国精神，如说日本是神国，祖先是天照大神；日本天皇是万世一系，天皇具神格，称为现人神；又说满洲建国，是顺从天意，和日本建国一样，日满两国为一德一心，有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日本的大神。即是满洲的大神，用这些谎言，以麻痹学生的思想，而达其奴化教育的目的。这是伪满的初期，学校里施行神道教育情况。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在学校里更变本加厉地施行神道教育，除在课堂里讲述神道和率领全校师生赴日本神社参拜外，还在学校校庭里，建筑神殿。这个神殿建筑，虽然工程不大，但要选择适当地点，并且还要工精料细。吉林女高神殿，建筑在原校门之西，地方较为宽敞，在殿之周围栽植树木，殿之前面，修建一条石头甬路。别看这个殿高七八尺、宽五六尺的木造小房子，建筑费用竟花到4 000元左右。神殿修好后，要奉迎神玺，我亲自去长春（新京）建国神庙奉迎，还有我校村川副校长给我保镖，我们两个人实心实意地去长春办理这件重大事情。

吉林市内当时共有男国高六校，女国高一校。在伪满康德10年秋季，由省民政厅派人领我们去长春迎接神玺。一共去了14人，日本人校长居多数，中国人校长，只有我和赵、莫3人。在出发前，要整备服装，也就是要穿协和服，戴协和帽，佩协和带，还限定穿黑皮鞋。到达长春后，住在一个日本旅馆里，翌日清晨，我们这些人一同前往建国神庙。在神庙稍息后，由一位神官引导我们到神位前，然后由四五个神官举行仪式，并有几个神官在旁边作乐，其仪式我还不甚懂，什么迎接呀，修拔呀、奉奠呀、送神呀，最后每校交给一个木匣子。我是双手奉接，不敢怠慢，这样足足搞了一个多钟头，然后才退出建国神庙，各校分乘汽车，直驶长春车站。登上了火车，将神玺放在车内小桌上，我们十几个人，是态度庄严，敬谨护卫，未敢稍

有限越。乃至回到学校后，早有教员和学生，在校门前迎候。我把这个木匣子，放在校长室内，着专人看守，第二天才纳入学校神殿以内。在纳入的时节，又请吉林神社的神官来学校举行纳入仪式，足足又搞了一天。学生停课，教员会餐，认为这是学校里一桩大事，这样我的奉迎任务才算完了。

学校神殿完成后，每天教职员和学生到校，都要向神殿行礼。午后退校也要行礼，如果有谁藐视，或者不行礼，即认为大不敬，要受到严格的处分。神殿的钥匙，放在一个小木箱里，白天晚上，分别由值日值宿者保管。在当值簿上，还要记载神殿的情况，如果没事，即写“神殿无事”四字，其事的重要，可以想见。在大战方酣之际，日本海、陆、空军在各地节节失利，因此学校里对学生更加紧灌输神道教育。不仅在学校里早晚要向神殿行礼，还在每星期一全校师生结队赴吉林神社参，以祈祷日本的武运长久和大东亚的圣战完遂。在此时期，吉林市国高学生所受到的奴化教育已达到了一个相当程度。乃至1945年8月15日祖国光复，日本降服后的第二天，我校教员和学生将神殿打倒拆毁，我将里边的神玺取出一看，原来是十几个汉字（字句忘记），写在一个厚纸条上。当时想，为了这几个字，我曾经付出很大精力，真是啼笑皆非。

徐渐九事件

张云腾

1937年（伪康德4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使东北彻底殖民地化，又玩弄新的花招，决定在伪满洲国首

都——新京，建立一个所谓的“建国神社”，供奉日本国神——“天照大神”。日本帝国主义者又让伪满皇帝溥仪于1940年（伪康德7年）第二次访问日本，叫他把日本的“天照大神”（实际是一支剑和一面镜子）捧回来，当做伪满洲国的“建国神”供奉在“建国神社”里，表示伪满洲国的建立，不是起源于清太祖，而是和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说明伪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神光保佑下建立起来的。并在伪《治安法》中规定：“如对建国神社有不敬者，要判处一至七年的徒刑。”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和镇压，是言出法随的。从徐渐九事件中，可以得到充分证实。

徐渐九是伪满铁岭市长。因是外县人，不知其籍贯，亦不详其身世。据说曾于日本某大学毕业，精通日语，当然与日本人有交往和联系，博得日本人的信任。当时日本人所扶植的傀儡和培养的奴才大多私心太甚，奴性十足，只知有己而不知有国家、民族，对日本侵略者俯首贴耳，他们甘当奴隶，引以为荣。但也有极少数人，有正义感，有爱国心，毫无奴颜媚骨。越是和日本人往来，越感到自己被歧视，受凌辱，因而越觉得日本人可憎，祖国可爱。徐渐九就是这样一个人。

1942年（伪康德9年）8月伪铁岭市召开暑期教员讲习会，会议的议程有市长训话。至时，徐渐九市长出席了会议，他开始讲话了，但不时扫视会场，看有没有日本人。他又问在座的老师：“屋里有日本人没有？”群众回答：“没有。”他看没有日本人，憋不住了，眉昂色动地讲起心里话来。“你们看，他们口口声声‘日满一德一心’实际是叫咱们跟他们一德一心，他却不跟咱们一德一心，如果真是一德一心，为什么日本人吃大米是生活必需，中国人吃大米就是‘国事犯’呢？”

当他讲到战争形势时，他用教鞭指着地图慷慨陈词：“你们

看，这不是一道红线吗（图上用红线标志着日军已到之处）？这好像患疔毒症一样，起红线就危险了。红线越伸越长，毒火归心，就完蛋了。”

接着讲到“天照大神”，他义愤填膺地说：“叫我们供天照大神，老张家的祖宗，硬叫老李家供奉，行吗？”

最后又讲了世界形势，结论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他讲出了多少人要讲而不敢讲的话。

但不幸汉奸告密，第二天，日本拘捕了徐渐九。不仅罢了他的官，而且按伪《治安法》规定，说他对建国神社不敬，判处了徒刑。这就是在铁岭震动颇大的徐渐九事件。

这一事件的发生，使铁岭人民对日本法西斯更加憎恨，对自己的祖国更加热爱，对徐渐九寄以极大的同情。只因在日本法西斯严酷的统治下，人们敢怒而不敢言。

（摘自《铁岭文史资料》）

回忆为“诏书”所受的迫害

吴兆祥

我于1940年被伪吉林市政府教育科派充吉林市黄旗屯小学校长。当时不论中小学校都由上级颁发《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和《时局诏书》。这个小学校校舍很简单，只有7间房，3个教室、1间教员休息室，没有教员值宿室，也没有火炕。这对于保管诏书感到极大的担心和困难，有时候我把各种诏书放在家里，有时候放在学校里。放在学校的时候，夜间是十分担心的，怕盗贼把小木箱拆坏，又担心失火烧掉。当

时我心里想，这三个班的校长作不好倒没有什么，如果把各种诏书丢失或者焚毁，我这个校长就无法交待了。为了一劳永逸，于1941年春天我买了一张奖状用纸，仿照《国本奠定诏书》的字体和格式自己写了一份《国本奠定诏书》放在诏书箱里，把真的三种诏书放在家里的衣服柜里，每月的8号就拿出我写的这张“诏书”读一读就搪塞过去了。当时不仅学生不知道我读的是假诏书，就连教员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真是冤家路窄，1941年10月，有一天我正在讲课，忽然瞥见吉田（日本人）和杨夕健两位视学骑着车子风驰电掣地闯入院内，进入教员室。杨夕健说：“江南区某小学的《国本奠定诏书》是假的，往上追求责任，原任校长死了。因此我们要把全市各学校的诏书检查一遍。”杨视学的话还未落地，吉田视学戴上了白手套：“我要拜见诏书。”我一听大吃一惊，好像一瓢凉水泼在我的身上，头上冒出了凉汗。一看当时的处境简直是武大郎服毒，吃是死不吃也是死，所以我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校的全部诏书都放在我的家里，没有在这儿。”吉田说：“放在家里对于诏书恭敬吗？”我说：“不够恭敬可是很安全。”他又说：“为什么不把诏书放在学校呢？”我说：“学校没有火炕不能住宿，我怎能叫教员住宿。”质问了我几句后，他们匆忙地登上车子奔向他校去了。

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怕受到处分。在校长会议时，一听到关于诏书的指示，我就如坐针毡十分不安。1942年1月伪吉林市政府教育科将我调到德惠县城内西广国民优级小学去任职，被撵出吉林市。

害人的伪满“皇帝诏书”

陶 庸

诏书使人望之生畏

诏书的颁发与“奉戴”

诏书的书写格式：开头贯以“诏书”两个字，接着便是正文，正文完了，另起一行书有“御名御玺”四个字，最后才标明年月日。我所见到的诏书，也就是颁发给一般机关学校没有加盖所谓御玺的石印的诏书誊本。可是这一纸誊本，好不厉害，在由中央颁发给地方的机关学校时，却要举行十分隆重的“诏书奉戴式”。

当向学校颁发《回奎训民诏书》时，我正在凤城县立通远堡两级小学当校长。颁发到我们学校的诏书，是由凤城县视学徐典章搭车敬谨恭送到学校的。徐视学由县刚一出发，教育局长何泮林就和我有电话联络，叫我举行隆重的仪式，率领全校师生整队敬谨“奉迎”。当时我是小鬼接城隍，真是诚惶诚恐，学生列成四行纵队，教员在前，恭候在校门之外。这时我的服装是十分整齐的，身上协和服，头上协和帽，脖子上还挂有协和礼带。当我见到那位护送诏书的“使者”离我不远时，我随即戴上了洁白的手套，紧走两步，接过他用双手高举到头顶上的黄布包，接过了诏书，照例我也两手敬谨地高举在头上，亦步亦趋地走向校庭。这回护送诏书的使者，却退到我的身后，当我把诏书放在布置好了的垫有讲台的桌子上，后退五步时，护

送“使者”已毕恭毕敬地登上了讲台，这时我们全校师生早已回到校庭整队等候。当司仪宣布开会，“使者”抽开封筒，十分斯文地揭开诏书。当他开口读出“诏书”两个字时，我们全体师生立刻俯下头来，屏息倾听，在听到读至“康德二年五月二日”的最后一句，全体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这次的“奉戴仪式”是在徐视学简短的训话后结束的。仪式完了，我把诏书“奉戴”到校长办公室离地七尺修好了的靠壁的木架上，外面罩以黄布，真像供奉祖宗神灵一样。“奉戴诏书”还有些注意事项：非遇盛典与意外，平时不得移动位置；如果稍有污损，甚或不幸而有所焚失，则以“大不敬罪”论处。因此这个神圣庄严不可亵渎的诏书，竟成了使人望之生畏的不祥之物了！

平日的敬谨“奉护”

两份诏书对我个人的压力实在也不小，第一次“奉戴”诏书时，我担任校长，在职期间我是十分忐忑地“奉护”它，不敢稍有疏失。以后我做了教育行政工作，负有监督“奉护”的责任，一个学校的失慎，我也会代人受过的。

颁发到学校的诏书，多数都是高置在校长室里正面墙壁的木架上，一般学校置备不了“奉安库”。平日对诏书的保护，是十分担心的，若是遇到寒暑假，问题就更大了。校长教员常要参加短期的集体训练，无事也该回家休息休息，学校只留一两个工友，是不太保险的。要想把诏书移动到安全的处所，也怕被坏人告发，说什么无故移动诏书是大不敬。但是事情都有例外，胆子大的，人缘好的校长亦自有其不能告人的办法。

我担任过安东、凤城两县教育科的学务股长，也做过通化县的教育股长，虽然对诏书不负直接“奉护”的责任，而间接的监督“奉护”的责任并不轻，在学校的寒暑假期间，担心各校诏书的安全，有时连觉都睡不好。为了避免代人受过，我想

出一个办法，在每届假期之前，都向各校下达“敬谨奉护诏书，不得疏失”的训令。表面是为了提醒各校长的注意，实际是意在万一发生意外，给自己找辩解的理由。

诏书污损与焚失就是大祸临头

凤城县对遭受水灾各校损失的诏书的苦心处理

1937年农历七月初二，正是全县教师集体训练最紧张的一天，教育局把全县教师集合到城里，事前并没有顾及到各校诏书的安全问题，更没有想到恰好在这期间城南依兰勒勒河流域发生了百年未有的大水灾会祸及诏书。那年夏季雨水较大，依兰勒勒河上游地区山洪暴发，好像瀑布似的直泻下来，平日卷起裤管就能徒涉的小水，彼时则有如长江大河，使人望之兴叹。由于正值七月的朔日，黄海的潮水尤大，大洋河的水反而向上源倒流，使得龙王庙附近几十里方圆顿时变成汪洋泽国。人畜的伤亡，农田的被冲与屋舍的被毁，损失之重无法估计，是百年来所未曾有过的，但是并没有引起伪省、县当局的怎样注意。这次水灾，使陶家堡、温家堡、敖家堡与除里沟几处校舍都被冲倒，龙王庙校舍被淹没，还有好多校舍被冲毁。这虽然不是小事，但凤城县教育局并不是对几十处校舍被冲倒与冲毁感到可惜，而是为被污损与冲失的几十份诏书，大为焦急与头痛。那时，教育局长缺员，由学务股长刘星一主持一切。经他初步调查，在水灾中污损与冲失的诏书不下三十几份。刘星一作过翻译，一口好日本话，在“参事官”宫泽次郎面前红得很，加之是伪满大同学院出身，神通也大，所以这个事件由他处理，可能问题不大。但是他一心要当官，却不敢把这一实际情况报告上去，深怕影响他的将来。因为他在召集全县教师到县训练时，并没有对诏书的安全作出要慎重保护的安排，他是有渎职过失

的。

第二年(1938年),我从县立文庙小学调到教育科作礼教股长,当时教育科长是前任视学徐典章,学务股长是李宝云。我们三个人都是不懂日本话的“白帽子”,胆子小得很,甚至连树叶落下都怕打脑袋,哪里经过这样的大事,真是愁煞人也!不过事已至此,不能再拖,必须硬着头皮,具实呈报,请求处分。但是也怕受到“领导疏失,奉护无方”的指责而遭到无情的处分。就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学务股长李宝云,情急智生,要伪造诏书,就议于我。当时我是愣装大胆,不仅赞同他的计划,也给他出了一些点子。县里本来设有自办的“官立印刷所”,在得到印刷工人的协助后,由我们科里的职员蔡长奎照样描绘了一个底板,付印之后,确实真假难辨。随后秘密分发到20多个学校里,以补充损失的数目。关于陶家堡、温家堡、敖家堡以及赊里沟等几处学校所损失的诏书,却具实呈报了,这个呈文是李宝云亲手拟的,他把温家堡、赊里沟两个学校的诏书,说成仅被污损并未冲失,而陶家堡工友于某被水淹没身死,找到为“奉护”诏书而殉职的借口。至于敖家堡小学由于教员殷兴德的妻子因暑期守护学校,大水袭来,全家命尽,诏书冲失又情有可原,具实呈报原无妨碍。这样的构思,实在是急难中挤出来的。我在这方面又出了一点力,就是我代替陶家堡教员赫贵纯拟了一个呈文,是以于工友为奉护诏书而惨遭灭顶,请求给予抚恤,以昭示奖劝。当赫贵纯把这件呈文送到县里后,大受赞赏,李宝云更乐得不知怎么的好了,在向伪安东省呈报县下学校诏书在水灾中遭到污损与冲失情况的同时,也把这件呈文抄出附件一并恭呈上去。事后确由省拨下一笔抚恤金来,因为于工友是独身,就作为给他重置棺槨,重新典祭的费用。关于诏书一案,也得到了省里以“备案”了之的法外赐恩,而告结束。

这真是天大的幸事。

安东县小学诏书的丢失与被焚，几乎酿成冤狱

1939年春，我同徐典章一起调到安东县教育科，徐任科长，我是学务股长。到差不久，就受到伪县长宫文超的嘱托，叫我们对前阳山村小学教员于老师，不要轻易更动，因为他校的诏书，被人偷走了，交接时会露出马脚的。于老师是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事出后几次想要逃跑不得，又要自寻短见，幸亏经过伪县长宫文超的安抚，并告以机宜，才暂时安下心来。1940年春，宫文超事先得到有被转动的消息，他想到经过自己帮助掩护的“空印盒”，始终是危险的，他又把科长和我找到面前，计议处理办法。当时我提出由我回到凤城取来一份仿制的诏书以事顶替的办法，徐典章还有点犹豫，而宫文超却喜出望外，让我立即写五天出差凤城的“出差命令书”。实际由安东到凤城，乘火车一天可以往返两次，用意叫得多得几个出差旅费，以示薄奖。凤城教育科保管这份诏书的是我的老同仁、好朋友彭书城，当我向他说明来意，他就偷着拿出一张给我。在我返回安东见到宫文超，报告“不辱使命”的经过后，即电召于老师到县领诏书，在我向于老师谈话时，又制造一套言词，说什么这是我们过去保存的一份诏书，领回后，要慎“奉护”，并要保守秘密，不得让其他人知道。于老师再三称谢地走了，这个久悬的案子，也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俗话说得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41年初，安东县又出了一件学校诏书被焚的事故。事故发生的时间，是在那年农历的春节，大东沟街一家药铺不慎失火，风大火急，片刻之间一切化为灰烬。不巧得很，春节前大东沟后一处小学的宋老师偏偏把诏书送到该药铺来保管，大火之后，连诏书的余烬也看不到，这个天外飞来的灾祸，是宋老师万万也想不到的。宋

老师年岁较高，更是怕事。事故发生后，不知怎样处理才好，就贸然来到教育科，并未经过我们的引介就闯到徐科长的面前，惊慌失措地报告诏书被焚的原委。当时正值日、满两个视学都在旁边，三个人便交替地追问起来，样子真像“三堂会审”，日本视学井科荣吉，是科里掌实权的真头子，他听不懂中国话，就由视学崔文宝作翻译，当情况了解后，他认为教育科处理不了这个案子，就把这个所谓大事故报告给副县长渡边三浪。渡边出身于上海同文书院，是个中国通，还会一口流利中国话，从他取名三浪不叫三郎，也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不好应付的怪物。他把科长、两个视学和我都找到面前，大发雷霆地斥责了一顿，更无情的是决意要把我们（不包括他们日本人）都给予应得的处分。我作学务股长的责任较大，所幸由于我在寒假前拟过“敬谨奉护诏书”下达各校的训令，渡边在言词上对我放宽些，而对徐典章却毫不容情，声色俱厉地追求责任。弄得徐典章回到科里，对着两个视学，大哭一场。什么案件，一到渡边那里，小的会变大，简单的会变复杂，愁得徐典章如丧妣妣，几天愁眉苦脸，失去了科长的气派。可是他并不老实到底，还要找个垫背的，立刻监视了宋老师的行动，必要时想把宋老师从严惩处，叫人坐监，以减轻自己的过失。因为在敌伪统治时期，“奉职无状”就是过失。冒失鬼不压事的渡边三浪，不等教育科研究出办法来，就向伪安东省文教科作口头的报告，并研究对责任者如何处理的问题。当时文教科长是由吉林高师调来不久的小松先生，他是作过大学教师的，比较稳健和聪明些。他知道这在“满洲人”看来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可是在他们日本人的眼里，什么诏书不诏书的，皇帝那个活人还不是他们安放的牌位么？而且各校的诏书，又本来是个誊本，更不该以假当真，况且如上报“中央”，省县当局多少都有责任，岂不是弄巧成拙，反而自

讨无趣么？还不如压下的好。至于小松向渡边怎样解释的，我们虽不是详细知道，不过我们再见到渡边三浪，他却已平息多了。

起初在渡边返县后，我们全体教育科同仁都捏着一把冷汗，认为凶多吉少，万没想到渡边这个家伙有好几天不好意思到教育科来，只通过井科荣吉转告教育科放回宋老师。到此我们才如释重负，精神顿觉轻松。最后教育科对这一案件的处理，也是在渡边三浪示意之下不了了之，只存案不上报而告结束。这次风浪平息后，我调回凤城做学务股长，徐典章则降职一级，调到省里当股长，毫无疑问这都是渡边的意见，给我们一个轻微的调职处分。

诏书本是一纸誊本，竟使人望之害怕，仔细想来，并不奇怪，它背后有几个作祟的东西在。在敌伪统治的十几年当中，诏书委实压得我好苦，有谁想到它也有个无人理睬、废纸不如下场？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了，伪满垮了台，日本也险些亡国。在“九·三”胜利的前夕，伪通化市公署在院内举行了一个散伙仪式，那是我从伪通化省转来不到一个月的事。我看到伪市长赵长生，从“御影橱”里捧出了一向被称做御影的溥仪像和两份神圣不可侵犯的诏书，一齐投到事先在厅前挖好了土坑里，点起火来，随着青烟的上升，再也没人为之害怕了。至于最后存在各校的诏书，任你做废纸，也无人过问了！